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章太炎的「神經病」作為生存位置與革命知識情感動能

Zhang Tai-Yan's "Insanity" : Affect, Survival and Revolutionary Knowledge

doi:10.6752/JCS.201303_(16).0004

文化研究, (16), 2013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6), 2013

作者/Author : 劉人鵬(Jen-Peng Liu)

頁數/Page : 81-1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303_\(16\).000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303_(16).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Zhang Tai-Yan's "Insanity":
Affect, Survival and Revolutionary Knowledge

Jen-Peng Liu

章太炎的「神經病」：
作為生存位置與革命知識情感動能

劉人鵬

本文是國科會計畫（編號：100-2410-H-007-053-MY3）成果之一。初稿曾以〈「神經病」作為生存位置與知識情感動能——兼論章太炎讀盜跖〉為題，發表於「章太炎思想世界的新聞掘學術論壇」（2012年11月9-11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感謝與會學者討論意見。本修訂稿則要特別感謝《文化研究》編委會以及匿名審查所提供的醫論相關資訊與參考意見。

劉人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電子信箱：jpliu@mx.nthu.edu.tw

airiti

摘要

1906年，章太炎(1869-1936)在日本〈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中，提出「神經病」作為召喚革命感情與學問事業的重要動能。本文試圖提供一種理解章太炎生命與學術的方式，是重新思考章太炎的「神經病」作為一種經驗立場，以及經常被忽略掉的作為革命知識與感情的重要動能。本文大略追究了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神經病」一詞的源流與多重語義，並且從兩個脈絡閱讀章太炎的「神經病」，一是「革命者」，一是有「腦病」的人。透過這二個線索的閱讀，本文一方面試圖將「神經病」的具體血肉經驗清晰化，另一方面也將章太炎的「神經病」闡釋為一種論述位置，亦即一個說話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凝聚了章太炎經驗、政治、社會以及知識立場。

關鍵詞：章太炎、神經病、革命、癲狂、腦病、癲癇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the life and work of radical intellectual Zhang Tai Yan (1869-1936) by rethinking “insanity” as both an experiential standpoint and an overlooked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knowledge and affect. When giving a speech in Japan in 1906, Zhang Tai-yan used the unlikely term “shenjing bing” (literally nerve disease, but meaning insanity or, more colloquially, a person who is “psycho”) to evoke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ary knowledge and affe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eanings of “shenjing bing” from the late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e paper then reads Zhang as a “shenjing bing” in two ways, as a revolutionary and as a person with a “brain disease” (he was epileptic). Through this double reading, the paper attempts, first, to articulate (rather than avoid) the concrete, embodied experience of “shenjing bing.” Second, “shenjing bing” is explored as a discursive position, a speaking site where Zhang’s experiential, political and social groundings converge in an epistemological standpoint.

Keywords: Zhang Tai-Yan, shenjing bing, revolutionary, insanity, brain disease, epileptic

所謂政治，許多都是從個別主體的肉體穿透皮膚而活出來的。

(海澀愛¹)

一、重讀「承認我是瘋顛，我是有神經病」

1906年6月，章太炎39歲，甫自上海服完人稱晚清最後一次文字獄「蘇報案」的三年監禁，在同盟會《民報》革命同志接應之下，立即東渡日本。章太炎後來在一次簡短的訪談中說，這是個「不得已」的決定，因為出獄當天原有朋友邀住新成立的中國公學，但對於一個剛出獄的革命者，大家都懷著忐忑不安的安全顧慮，儘快出境根本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張庸 1977〔1912〕：256）。三天後的《申報》還轉載了「章炳麟出獄」的消息²。章1903年因革命思想言論而入獄，在當時已經是社會及上海租界區國際矚目的一件事，經歷囚禁凌辱（詳後文），個人的身心衝擊可想而知。出獄旋即倉皇潛往日本東京，當天留在章太炎腦海中的畫面之一，在多年後《太炎先生自定年譜》的記述裡，是一幅彷彿牢獄積累了政治資本後的英雄凱旋入京圖：

余抵東京，同志迎于錦輝館，來觀者七千人，或著屋檐上。（章太炎 1986〔1928〕：11）

大約二週後，七月十五日，東京留學生又舉辦歡迎會，章再次面對群眾的蠡湧來潮：二千人「植立雨中，無惰容」聆聽他的演講（民意 1906：119）。然而此刻章太炎就著自己「平生的歷史，與近日辦事的方法」（章太炎 1906a：1），發表一篇弟子稱之為「最警闢有價值之救國文字」（許壽裳 1985〔1936〕：2735）、「歡迎會上發獅子吼³」（許壽裳 2004〔1945〕：36）的演說，卻是以「神經病」為

1 海澀愛(Heather Love)2010年12月在台演講“O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Feeling Backward, Feeling Bad”演講稿全文中譯請參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2012: 184)。

2 〈章炳麟出獄〉，《申報》第11925號，1906年6月30日，第17版。

3 按〈獅子吼〉也是1906年於《民報》「小說」欄連載的作品，作者為陳天華（當時署名「過庭」、「星台先生遺稿」），內容與排滿民族革命有

自我認同以及召喚革命情感的身分及身體位置：

獨有兄弟卻承認我是瘋顛，我是有神經病。而且聽見說我瘋顛說我有神經病的話，倒反格外高興。（章太炎 1906a：2）

過去學者對於該篇〈演說錄〉中的「神經病」一詞，已指出其作為喻詞的意義，如：

太炎的意思很明白，所謂「神經病」者，乃是一種不計成敗利鈍的幹勁，以及不趨時尚與世俗的精神。有了這種幹勁與精神，才能搞革命。（汪榮祖 1988：10）

又如：

他認為革命者需要一種矢志不移的精神，一種近乎「執迷不悟」的品格，他稱之「神經病」。（武繼山譯註 1997：123）

此外如王汎森曾提及章太炎的「瘋」：

章太炎素以「瘋」出名，並以瘋自負，他的瘋其實就是任心直往，蔑視客觀的拘束以及人情的束縛。（王汎森 2003：156）

這些說法都指出了一種可以常態理解的「神經病」作為隱喻的意義。但也許我們可以好奇地追問：為什麼章太炎會把「矢志不移的精神」與「近乎執迷不悟的品格」、「任心直往」這些崇高的精神品質，不斷用「神經病」來表意？本文希望配合其他相關文本，試圖梳理此刻章太炎將「神經病」這19世紀新出現的現代醫學病症中文詞彙，連結於干犯社會政治秩序意義的「瘋癲」，其中可能涵藏的更多血肉脈絡與意義。亦即，本文認為「神經病」在章太炎的生命經驗與知識情感脈絡中，除了該篇演講所強調的革命意義，與稱呼革命者或革命言論為瘋癲狂妄的傳統意義外，也許可以更多斟酌於現代指涉病症及干犯社會政治秩序意義之語境及其與知識感情型態的關係。作為一種具體真實的、被政治及社會秩序指認為病理性或異常性的身體與情感成分，不僅止是輕鬆有趣的隱喻。再者，透過細讀章太炎的文字，本文也想指出章太炎的革命與學術所強調的「感情」為動能的特質，以及「神經病」作為一種生存與論述位置與其學術生命氣性的關連性。在

關。見《民報》第二至九號。

本文的最後一節，將以章太炎對於《莊子》盜跖的閱讀為例，說明當時相對於「聖人」位置（本文以康有為為例代表）的思想情感，章從另外的位置對於「聖人」理想的批判與遺棄，所開展與解放出的政治性，本文概括性地暫以「神經病」來命名這個生存與知識感情位置。這裡多少具有一種故意：試圖突兀地呈顯出這是一種介入式的閱讀，並且認為，凸顯出這種以「不正常」介入作為閱讀位置，是重要且必要的，因為「正常」的閱讀通常看不見「正常」位置的已然介入。今日學術史對於章太炎作為國學大師或是晚清革命知識分子言論思想的研究裡，當然看不見章太炎「神經病」的身體歷史情感與血肉脈絡，而關於章因革命被捕入獄及「章瘋子」等相關事蹟傳說，則多出現於傳記敘事，二者分到不同的知識範疇中，甚至只認得前者為學術，而後者學術性則難以識別。本文試圖從「革命者」與「腦病」這二條線索的閱讀，一方面試圖將「神經病」的具體血肉經驗清晰化，另一方面也將章太炎的「神經病」闡釋為一種論述位置，亦即一個說話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凝聚了章太炎經驗、政治、社會以及知識立場。

首先我們細讀章太炎〈演說錄〉中「神經病」一詞出現的脈絡。章太炎說：

大概為人在世，被他人說個瘋顛，斷然不肯承認，除那笑傲山水詩豪畫伯的一流人又作別論，其餘總是一樣。獨有兄弟卻承認我是瘋顛，我是有神經病。(2)⁴

章為何被人說是瘋顛？首先他排除了風格化或藝術才氣的笑傲山水型的瘋顛，而在演講一開始就指向是因為主張革命。章略述自少年以來漸漸養成的「逐滿獨立」民族思想，提到他少小的時候讀到蔣良騏的《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裏第一恨事。」(1)〈演說錄〉的主文本與明顯主題是逐滿民族革命，但我們細讀，潛文本與情感可能也是對於言論觸法犯禁之瘋狂歷史人物的哀悼與繼承。這些歷史人物曾經是作為壓迫性的統治系統之威脅而存在，一種系統視之為無法容忍而必

4 編按：僅標註頁碼處，均出自〈演說錄〉。

須消滅或處理的異物，這些人物在章太炎演講鼓舞革命的敘事中，活化為一種似是注定的必然歷程，是章太炎少小時就出現於生命記憶，成為日後放不過的憂鬱哀悼與紀念繼承。這些人物不乏在歷史文本中已經被指控為「狂」者，例如，蔣良騏《東華錄》記載名世「語多狂悖」、「狂誕之徒」（卷二十一）。章太炎1907年刊於《民報》增刊的〈討滿洲檄〉（當時署名「軍政府」）一文，亦提及戴名世、查嗣庭等人，就是放在「文字之獄」的脈絡裡，強調的正是他們「皆以議論自恣，或託諷刺國詩歌、字書之間，虜遂處以極刑，誅及種嗣，展轉相牽，斷頭千數。」（章太炎 1907a：4）數罪討伐的動力之一，是對於這些因「議論自恣」而遭殺身之禍之生命的不肯也無法輕易放過。後文我們將再詳論，對當時的章太炎來說，這不僅是一個文人或知識分子對於歷史人物的哀矜之情，同時更是自己類似的身體位置座落所在而產生的親近性，也是政治立場的思想與情感動能之一。

章太炎〈演說錄〉中追溯其思想資源，提到少小讀《東華錄》的文字獄案件就「胸中發憤」，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的書，「民族思想漸漸發達」(1)，但章說這些猶欠缺「學理」，甲午之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纔有學理收拾進來」(1)。在這段敘事中，演講的文類限制及演講場合的需要下，他把「逐滿獨立」敘述成透過自身自幼閱讀舊籍的經驗與感情發動、又獲得當代學理驗證、一貫而具有目的性、具有行動動能的思想。這當然是對於複雜而充滿偶然性與不得已性的生命歷程一個簡化而功能化的說法，但這個敘事值得注意的是，身體與情感緒的經驗，在敘述中是先於「學理」的，「民族思想」（演講最後稱為「民族主義的學理」）是加強或驗證性的後援論述。事實上，他後來在〈排滿平議〉一文說得很清楚，任何「主義」都是為了解決眼前的實際問題（「事」），而非超越時空而演繹的抽象理論：

凡所謂主義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學說所成，非冥心獨念所成，正以現有其事，則以此主義對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設一主義，則等于浮漚；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義，則同于芻狗。（章太炎 1908a：12）

〈演說錄〉提到，自一開始將這最後證明為正確的民族思想透露與朋友，朋友的反應就是搖頭否定與警告：

當時對著朋友說這逐漸獨立的話，總是搖頭，也有說是瘋顛的，也有說是叛逆的，也有說是自取殺身之禍的。(1)

將政治上意圖革命或叛逆者稱為「瘋顛」或「狂妄」，是傳統熟悉的語彙⁵，而狂妄的政治叛逆者即刻準備面對的是殺身之禍或牢獄之災，也是該語彙傳統語境熟悉的涵意。在這段文字中，章太炎緊接在朋友對於革命思想的搖頭警告之後的，是弔詭地似是從小堅定固守的一種意志選擇的「瘋顛」：

但兄弟是憑他說個瘋顛，我還守我瘋顛的念頭。(1)

然而我們再接著讀後文，卻發現這話其實是回溯性的，亦即，回頭看自己當時面對朋友的不以為然卻仍然堅持，簡直是瘋顛。接著他回想起當年第一次到日本⁶，初見孫中山時，此刻他描繪出一個同樣被視為「奇怪」的孫中山，及圍繞在孫中山旁邊各懷心思、熱心並不在於革命的來往看客：

壬寅春天，來到日本，見著中山，那時留學諸公在中山那邊往來，可稱志同道合的，不過一二個人。其餘偶然來往的，總是覺得中山奇怪，要來看看古董，並沒有熱心救漢的心思。(1)

章太炎說，在這種情況下，他曾經絕望過：

暗想我這瘋顛的希望，畢竟是難遂的了。(1-2)

他曾經想要選擇遁世出家：

就想披起袈裟，做個和尚，不與那學界、政界的人再通問訊。(2)

據章後來自述，少年時期的他「尤無意於釋氏」，三十歲左右初讀佛書亦「未有所專精」，直到這次遭禍繫獄，才專意精讀佛典（章太炎 1985b [1913]：2649-2650），獄中還曾對著一同繫獄服刑的鄒容講

5 參考楊宇勳(2003; 2006)，特別是在宋代資料中檢得多條「政治圖謀不軌的行為，可稱為『狂謀』、『狂悖』、『狂人』、『狂生』之類」的例子。另外，中國傳統「瘋狂」的多重意義請參Hsiu-fen Chen(2003)。

6 按1902年章太炎在東吳大學因「言論恣肆」受到江蘇巡撫關注，於是走避日本，時孫中山寓處橫濱，二人訂交。

說佛典，謂「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章太炎 1985a [1908]：229）這個過程，說明佛學之於章太炎，並不是象牙塔的學術，而是面對困頓的資源。他也曾說「余自三十歲後，便懷出世之念，宿障所纏，未得自在。」證諸1907年後諸多記載提到他曾具體想籌錢到印度出家（湯志鈞編 1979：295-297），我們可以想見，極度介入現實卻又被人視為離開了政治社會現實的「革命」，與看似脫離現實、主動遁離政治社會的「披袈裟做個和尚」，在章太炎的生命與思想實踐中，其實很可能經常都是一線之隔，一念之間。接著演說以近似「出櫃」⁷的方式，「承認我是瘋顛，我是有神經病，而且聽見說我瘋顛，說我有神經病的話，倒反格外高興。」⁽²⁾為什麼呢？以下這段話後來成為章太炎的名句：

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纔能做到。⁽²⁾

章太炎這話很早就被引用了，「神經病」有時引為「腦病」，例如「太炎嘗云：『學者須有腦病，乃能治學有成；予亦有腦病者也。』」（錢大成 1948/04/09）但在〈演說錄〉中，對於「神經病人」的想像不止是「治學有成」而已，還包括：能「想」、敢「說」、能「做」，更能夠百折不回堅持「孤行己意」（章用了這個具負面性的詞彙），而且，所成就的「大學問」與「大事業」性質是「非常可怪」的。亦即，沒有「神經病」，就會停留在正常不怪異的思想框架裡，不敢有非常可怪之想，即使敢想，也不敢說出來，即使

7 本文在此突然用「出櫃」一詞也可說是不倫不類。「出櫃」是台灣1990年代出現的與同性戀運動有關的詞彙，由於同志在社會不認同或壓迫性的氛圍中通常無法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如同生活於「櫃」中，「出櫃」則是以某種方式公開承認同志身分。20世紀末台灣的同志與20世紀初中國的「神經病」當然社會脈絡與意義迥不相同，本文也尚未完整處理當時「瘋顛」或「神經病」的社會污名狀況。但章自己就說了，除了笑傲山水的風格型瘋癲，「大概為人在世，被他人說個瘋顛，斷然不肯承認」，這裡卻公然現身為一般人不肯承認的「神經病」，未嘗不是某種酷兒式的出櫃方式。本文這裡不倫不類的借用，也未嘗不是企圖連結不同時空的邊緣性身體語言的一種嘗試。

說出來，也不敢實踐，即使實踐了，沒有「神經病」也無法面對「非常可怪」的思想所遭遇的社會懲罰（艱難困苦）而堅持到底。「神經病」在這個脈絡裡，究竟只是一個關於「非常可怪」的形容詞，或者是著實的病名？並不容易判斷。事實上，章太炎接下來的例子中，不止使用現代指稱病名的「神經病」一詞，同時也並列了傳統中醫書裡與精神疾病有關的「臟躁病」⁸一詞，以及「瘋子」等詞彙。他以古今中外名人的例子，來說明「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纔能做到」(2)，舉出六個例子：

諸君且看那希臘哲學家瑣格拉底⁹，可不是有神經病的麼？那提出民權自由的路索，為追一狗，跳過河去，這也實在是神經病。那回教初祖摩罕默德，據今日宗教家論定，是有臟燥病的。像我漢人，明朝熊廷（筆者按：原文如此）弼的兵略，古來無二，然而看他〈氣性傳〉說（筆者按：原文如此，疑為〈性氣先生傳〉），熊廷弼剪裁是個瘋子。近代左宗棠的為人，保護滿奴，殘殺同類，原是不足道的。但他那出奇制勝的方略，畢竟令人佩服。這左宗棠少年在岳麓書院的事，種種奇怪，想是人人共知。更有德畢士馬克，曾經在旅館裏頭，叫喚堂官，沒有答應，便就開起槍來，這是何等性情呢？仔細看來，那六人才典功業，都是由神經病裏流出來的。(2-3)

這六個例子，章太炎分別以「有神經病」（瑣格拉底）、「是神經病」（路索）、「有臟燥病」（摩罕默德）、「瘋子」（熊廷弼）、「奇怪」（左宗棠）、「何等性情」（畢士馬克）稱之。從「有臟躁病」這個明顯的例子看，當章太炎在提出這些例子時，並沒有從疾病的意義直接跳躍到符號的比喻或形容義，而是在思考的當下就融合了二個層次的判斷：例如對於摩罕默德，明顯是用病症的字彙，但是病

8 按此為中醫病名，《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症並治第二十二」：「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章太炎在此用婦人病名，尚未查出是否有其他來源。「臟燥」或作「臟躁」，本文引用時依所見版本引為「燥」或「躁」，行文則用「躁」。章太炎在〈精神病治法〉一文中引《要略》而將此病視為十種「精神病」（章謂「世俗稱精神病，亦云神經病」）之一。後來有些中醫將臟躁指為「歇私的里(Hysteria)病症。」（陳邦賢 1991 [1947]：403）

9 按章〈演說錄〉用字與今習用者不同，如瑣格拉底（蘇格拉底）、路索（盧梭）等，以下引文皆依原字，行文則用現今習用字。

症語彙在章太炎此刻的脈絡裡，其實也就是如同日常口語形容性的「瘋子」一類，同時也就連結到日常的「奇怪」，而在章太炎看來，這同時也是一種不尋常的「性情」，也全部成了不尋常之「才典功業」的活水源頭，總名之曰「神經病」。這篇演說錄中，章太炎不僅使用「神經病」這指涉病症的現代詞彙以閱讀自我並命名自我，同時與中國前現代以來的傳統詞彙「臟躁症」、「瘋顛」、「瘋子」等並用，亦即，將這些詞彙指涉「病症」的意義，與指涉「言行逸出正常社會想像或規範之秩序」的意義結合並用。

在接下來的〈演說錄〉裡，「瘋顛」等傳統詞彙就不再出現，只用「神經病」一詞了，而且，漸漸專指革命氣性的意義，例如：

為這緣故（筆者按：指上文說到「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以及六個例子），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纔是要不得呢！略高一點的人，富貴利祿的補劑雖不能治他的神經病，那艱難困苦甚的毒劑，還是可以治得的，這總是腳跟不穩，不能成就甚麼氣候。兄弟嘗這毒劑是最多的。算來自戊戌年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纔拿得到。以前有三次，或因別事株連，或是普拿新黨，不專為我一人；後來四次，卻都為逐滿獨立的事。但兄弟在這艱難困苦的盤渦裏頭，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懊悔。憑備甚麼毒劑，這神經病總治不好。或者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於此。（3-4）

在這一段裡，「神經病」都指革命者，或是形容革命者，對章太炎來說，就是指他主張「逐滿獨立」。一方面，自己承認是冒著殺頭被捕的危險、並且實際上已經被捕坐牢，卻毫無悔意、堅持逐滿革命的神經病；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呼籲有更多人被稱為「神經病」，亦即同樣來參與逐滿革命，而且希望是能夠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神經病，是不會因富貴利祿或艱難困苦而痊癒的神經病。也就是說，「神經病」是一個對抗性的、要以毅力去堅持的倫理位置，拒絕以「治好痊癒」為目標。作為革命動力的「神經病」，不會為了獲得個人更安穩的社經地位而努力回復正常，不以在革命後獲得更富權利或更具保障的生活為目標，同時也不因任何懲罰而「治好」。這裡「逐滿革命」

與對於「富貴利祿」的批判，其實也是章太炎十分具體、特定的經驗、情感與知識立場或位置（詳後文）。他並呼籲人人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亦即，當公開承認為具有社會負面性的神經病時，為的是要更加堅定地站在這個負面的位置上，呼召更多的同伴一起發瘋，才能形成一種社群性的政治力量。接下來章太炎設想，人們將質疑，神經病意味著失序，如何可以成事呢？章對於這個問題解釋道：

若有人說，假如人人有神經病，辦事必定釐亂，怎得有個條理？但兄弟所說的神經病，並不是粗豪鹵莽，亂打亂跳。要把那細針密縷的思想，裝載在神經病裏。譬如思想是個貨物，神經病是個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濟；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以上所說，是略講兄弟平生的歷史。(4)

這裡指出，「神經病」是「思想」的有效動力，沒有神經病，縝密的思想就沒有動力，要把細密的思想「裝在神經病裡」，其關係比喻為「思想是個貨物，神經病是個汽船」，這些說法乍讀之下有點詭異而「神經病」，因為似乎並沒有解決前一刻提出的神經病是失序的質疑，他只宣稱他所謂神經病不是「粗豪鹵莽，亂打亂跳」，但究竟是什麼性質呢？沒有說，就直接比喻成必須裝載思想的現代運輸工具「汽船」了。這意味著，對章太炎來說「神經病」不需要先漂太白，就在它仍保留著若干負面意涵的情況下，看到它並非外界所誤解的失序，而其實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動力；「思想」不停留於腦子裡或書齋裡，需要「神經病」才有動能。這讓人想起魯迅回憶章太炎的名句：「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魯迅 2005〔1936〕：566），似乎也就把「思想裝在神經病裡」轉換成正常而不神經的說法了。魯迅這樣的轉換，當然把章太炎正典化了，學者更樂意引用，但付出代價的，是關於瘋癲神經病革命者在現實裡血肉衝撞的「學問」。演講到這裡，章太炎總結這是「略講兄弟平生的歷史」，也正是他的夫子自道：從少年對朋友說逐滿獨立，就被稱為瘋顛，在三十餘歲的盛年，為革命思想坐了三年苦牢，剛剛才出獄，立即又鼓吹革命，正是無可救藥的神經病。接著章太炎講「近日辦事的方法」，強調的則是「感情」，並且引用柏拉圖將「感情」指向「神經」：

當初柏拉圖說：「人的感情，原是一種醉病」，這仍是歸

於神經是了。(4)

「病」字對於章太炎來說，似乎隨時可以從負面性（失去正常的狀態）轉換為思想與行動的資源。而對於歷史中瘋癲神經病人物之憂鬱哀悼的負面情感，在只能積極向前召喚熱血革命的演講語言脈絡裡，只能潛伏或轉換移位，成為章太炎講辭中所強調的革命所需要的「感情」(4)：

至於近日辦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戰術等項，這都是諸君已經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沒有感情，憑備有百千萬億的拿破侖、華盛頓，總是人各一心，不能團結。(4)

如果說，這是一篇熱血激昂的演說稿，「瘋癲」是鼓舞人心的革命修辭，那麼，也許忽略了一個現實生活中被視為「神經病」或「瘋子」的生存性或身體性重量。章說，「要成就這感情，有兩件事是最重要的」，一是用宗教（佛教）增進道德，一是用國粹（指「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激動種性，這就是所謂「近日辦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國粹兩項」(14)，在這個脈絡裡，章所謂「感情」，不是指個人內在固有的情緒情感，而是指可以透過宗教、國粹等召喚或凝聚的群體性革命動能；另一方面，革命的群體也不是指現成的誰，而是要透過上述「感情」去產生的主體。這種強調以精神或情感力量鼓動現實社會的說法，在晚清維新及革命論述中並不少見，甚至是重要特質（王曉明編 2012：8-9），但把重要的精神力量不惜稱之為「神經病」的，則恐怕只有章太炎。演講結尾宣稱：

總之，要把我的神經病質，傳染諸君，更傳染與四萬萬人。至於民族主義的學理，諸君今日已有餘裕；發行論說刊刻報章的事，兄弟是要諸君代勞的了。(14-15)

雖然該篇演講主要篇幅論說宗教、國粹、人物事跡等，但章太炎是要把知識思想內容裝在「神經病」這種「感情」的汽船裡，也只有用「神經病」來裝載這些思想知識內容，才能達到革命的目標。他刻意用「神經病」及「瘋顛」貫串這篇演說，刻意強調演說者是一「承認」了社會稱之為「神經病」的人。下文我們將略述「神經病」一詞

的語義語用，並嘗試把這個「神經病」肉體化與社會脈絡化。

二、眩厥，神經病與革命

「神經病」一詞，在章太炎此刻使用之時，大約才剛出現於現代中文不久，是當時中國的新詞彙。以目前檢得資料看，此詞大約19世紀後期開始出現於中國報刊，通常指稱病名¹⁰。以「神經」一詞表達現代西方醫學所認識的身體組織，源自日人18世紀使用漢字對荷文的翻譯（王敏東 2010），當時應尚未有後來口語中諸如「神經兮兮」等調侃式用法¹¹。「神經病」一詞，則大約19世紀初已出現於日文漢字（王敏東 2010）。至於在中國，目前檢得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報刊中偶有「神經病」一詞，大多是在從日本引介醫學新知的脈絡中出現，已經透露了現代醫學連結於生活情緒管理之端倪¹²，總之是以科學知識的病名出現，而並非如今日口語中的「神經病」經常不指真正的疾病，也不像傳統辭彙「瘋」、「癲」或「狂」，既是中醫書裡的病症（陳秀芬 2003），同時也在日常語言中有著與疾病無關的意義，通常用於人們感受到某種行為或情感狀態與流俗或「正常現實」的關係發生了齟齬或斷裂¹³。

10 例如《申報》1889年5月3日〈聘請名醫〉：「日本報云：俄國皇后曾患神經病。」

11 疑章太炎1906年演講自稱「神經病」後，以「神經病」調侃章的用法不脛而走。例如蔡元培稱章太炎為「以神經病自負之章枚叔」（蔡元培 1984a [1907]：401）並於〈讀章氏所作《鄒容傳》〉一文中謂章太炎之疑吳稚暉乃「章君之神經作用也。凡人之神經，皆有想像作用，苟舉一想像而屢屢縲返之，則積久而神經中認為實事。又或他人有一想像而屢屢傳述於吾，吾屢屢聞之，則積久而亦認為實事。」（蔡元培 1984b [1907]：400）

12 如：「近年犯著神經病的人很多」，因此要講求「衛生的方法」，「當此經濟名譽、生存競爭最劇烈的時候，非十分訓練腦筋，使用腦力的方法，十分得益，決不能占優勝的位置。」（長生 1905：1-2）檢索1906年後《申報》，「神經病」一詞漸多，亦多指疾病，詞前多加「染」、「患」或「有」字等，如「此人當係患神經病，非兇犯也。」（《申報》1907年3月17日）

13 從後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觀點看，一個個體是瘋或不瘋，當然不盡然

在章太炎自己的醫學論著中，有一篇未刊稿〈精神病治法〉¹⁴，他並沒有區分「神經病」與「精神病」，而是依當時世俗用法等同二者：「世俗稱精神病，亦云神經病」（章太炎 1994a〔1910-1911?〕：131），將傳統中醫裡的癲、狂等，都放在該篇中討論。該文「神經」並不全等於西醫所謂神經，而是關連到中醫的「脈」，並且他強調《金匱要略》「血氣不足為癲為狂」（134）的說法。值得注意的是，「癲癩」列在這篇的討論中。此外，章太炎1924年的〈論百合顛狂〉，仍是討論「今世所謂精神病」，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別提出對於西醫說法的不同意。他認為，西方見到顛狂等癥疾，就解釋為「病在神經」，但他認為，如果不是「憂懼失望思慮過度」等，則「神經必不獨病」，他援用傳統醫學資源，把血、脈、七情等都納入考慮，結論是「是以神經之病，非安腦寧神諸藥所能獨治也。」（章太炎 1994b〔1924〕：278）這放在當時逐漸流行的西化身體及用藥觀背景脈絡下對照看（認為「腦為一身之主」，參張寧〔2011〕），章太炎對於醫學的這種從西醫看來似乎較「倒退」的看法，其實既是他一貫的對於文明現代性保持批判距離（詳後），同時也呼應著他與自己的「神經病」的關係——這是一個具有歷史的位址。

是醫學問題，而同時是意識型態、法律、社會與存在的問題。「瘋」、「狂」、「癲」，在非醫學專名的語境下，不論古今中外，似用以指許多所謂「不正常」或失序的行為或精神狀態。當它出現於日常語用，或特別是文學藝術領域時，也不一定是病理化或完全負面的，而常被浪漫化或風格化、特殊化。當我們更寬泛地檢視「瘋狂」一詞的各種語用脈絡，不論古今中外，會發現它具備十足的矛盾性，如Lilian Feder所說的英語madness一詞，可用於形容各種相互矛盾的態度，以及幾乎是任何可以正當化或被抨擊為極端的行為。例如，從政治上來說，瘋狂可用於理解一種長期被壓抑而感受到的不公不義，於是可賦予對抗行動以合法的動機，但它也常用於指控異議人士，以瘋狂之名予以懲處或監禁於精神病院；從社會來說，它有時被詮釋為一種心靈或精神的病態，但有時又是一種可以被接受的個人性，意味著終於從強迫性或壓迫性的社會價值當中撤回了；從美學上說，有時它被描述為絕美、終極的自我表達，但同時也是無可避免的自我毀滅。（Feder 1980: xi-xii）

14 這篇未刊稿著作年代不詳，今收於《章太炎全集（八）》（醫論集），該書按著作年代排列，將〈精神病治法〉列在1910年與1911年的著作之間，但未標示年代。章太炎為何始終未發表此稿，似乎耐人尋味。

陳秀芬(2010)曾考察1884-1913年之間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幾種新聞畫報中瘋人形象與社會處置，發現其時對於瘋人瘋病或瘋事的用語，極其紛繁，包括癲、狂、癩、痴等等傳統語彙，以及新術語「神經病」（出現於1909、1910年的《圖畫日報》）。陳秀芬從畫報圖繪時事的再現，觀察當時社會對瘋人的反應，發現：

瘋人所引發的社會反應頗為不同，有同情，有厭惡，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對於瘋人所製造的混亂場面，晚清社會最常出現的行為是圍觀、看熱鬧。這些旁觀者有對瘋人行徑表示出莫可奈何態度者，亦有試圖干預、意圖將之送法究辦者。（陳秀芬 2011：17）

瘋人瘋事在街上成為新聞畫報取材的對象，圍觀、看熱鬧與送法究辦等情狀並存，似乎呈現了現代早期的景況。值得注意的是，在陳秀芬的論文中，我們看到晚清現代警政機構成立之後，對瘋人的處置「不時見到巡警、巡捕活躍的身影」（18），陳文也提到，過去中國歷代政府對於瘋人，「除非他們犯有重罪（例如叛國、弑親）」否則「未必有具體的律法處置」（22）。18世紀中葉清律才開始有「前所未有的規定」，瘋人須監禁在家或報備官府，或下獄監禁(22)，19世紀末葉也開始倡議並設置瘋人院。我們從陳文中也看到，1909年後畫報中漸多出現希望警察機構對瘋人嚴加看管的呼籲，如「日前見，全井胡同，有個瘋人，隨走隨笑的，異常可怕，後來往南而去。哎呀，警爺們，碰見，何妨干預干預呢？」¹⁵1910年左右的畫報中也不時有「為什麼不把他送到瘋人院調治去呢？」(25)的評論。但時間更早一點的狀況，例如1906年之前，環繞章太炎生活周圍的狀況是如何看待瘋癲，目前尚未見研究成果。然而我們注意到，陳文引用的案例中，有一則題為「瘋症發作」的時事畫，是關於「羊癩瘋」的：

初三日，下午一鐘餘，友人見東單牌樓，二條胡同，有某宅的子，手提著絡天，並一個大碗。走的好好的，忽然犯了羊癩瘋。當時跌倒，嘴流鮮血，看著令人嗟嘆。後來

15 《淺說日日新聞畫報》，1909/冬月/27，「瘋人可怕」，轉引自陳秀芬(2011: 23)。

不知如何走了的。哎，可惜他這歲數嘞，可憐。¹⁶

陳秀芬於此評論道：「從本則看來，在清末所謂的『羊癲瘋』似仍屬於瘋症的一種。」(18)梁啟超1901年的〈康南海傳〉介紹康有為的大同學說，曾提及爲了要「進種改良」對於遺傳性的「腦病」，與其他「廢疾」一般，想像給予「止產藥」使其絕種：

又凡廢疾者，有腦病者，肺病者，又曾犯某某類之重罪者，若經名醫認其有遺傳惡種之患，則由公局飲以止產藥，無俾育茲稂莠，如是則種必日良矣。(梁啟超 1987 [1901]：27)

以上是對於瘋癲略傾負面的看法或用法。但我們在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何震、劉師培文章裡，也看到關於瘋癲的另一種視之爲策略性的語用。何、劉說，傳統中國雖是專制政體，但實則與「無政府」略同。何、劉認爲，對照於當時世界現代政府警政法律日趨嚴密的管理，中國政府的虛與委蛇，正好使中國人民「利用其政府之腐敗，以稍脫人治之範圍，而保其無形之自由。」例如有越獄的案子，就說是因爲「大風雨」，有逆倫的案子，就說是「患瘋癲」，常常就這樣搪塞過去，不再過問實情：

中國辦事動需援例，其合于例者，不問情實之若何，雖情僞百出，亦將照行。復有一成不變無所取義者，如遇有越獄之案，則必曰大風雨；遇有逆倫之案，則必曰患瘋癲。州縣以上上之，部寺即以此受之，萬事一律，從未聞加以駁詰。(震 [何震]、申叔 [劉師培] 1907：137)

以上的語用多少表示，「瘋癲」一詞的意義或用法總是浮動的。

章太炎素有「章瘋子」或「神經病」之稱¹⁷，這在民國以後尤屢見於報刊¹⁸，如《申報》一篇時評〈說神經病〉，即以「人每謂章

16 《淺說日日新聞畫報》，1909/冬月/07，「瘋症發作」。轉引自陳秀芬(2011: 18)。

17 他人追述章太炎被稱「瘋子」的事件，早在1898年，與排滿言論有關。見劉成禹(1875-1952)(2010：204-205)；但湯志鈞曾指出其言有誇張失實者(湯志鈞編 1979: 66)。

18 以目前檢索所見，《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查無「章瘋子」；《申報》則檢得最早爲〈奇哉章瘋子〉，《申報》第14353號，1913年1月27日，第3版。

太炎有神經病」開頭¹⁹。1915年新聞中亦稱章太炎為「素患神經病之老書生。」²⁰也曾有他診斷出「神經衰弱症」之說（黃遠庸 1990〔1914〕：192）。另有一說謂瘋子、精神病者，是章太炎惹事之後朋友為他開脫之辭。「章瘋子」之稱又屢見於友朋時人稱述章太炎軼事者²¹，當然，還有一種稱他「發狂」的用法是指他經常發瘋罵人²²，隨時以杖擊人或用肢體語言表達意見。許多人津津樂道章太炎自己也稱自己「章瘋子」的故事，但也有他的朋友刻意指責或否認這個綽號²³。上述諸多稱呼，確實意涵並不清楚，至於為什麼章太炎被稱為「章瘋子」，更是眾說紛紜，本文並不擬追究。此處想先指出的是，稱一個言行「異常」的人為「某瘋子」，古已有之，而且不一定是指有神經病的病症，也不一定完全是負面評價，例如南宋《癸辛雜識》記述一位張姓醫官：「言語好異，人目為『張風子』。然其人尚義介靖，不徇流俗。」（續集下〈老張防禦沈壺〉）在章太炎生活之當時，稱某某人為某瘋子也並不罕見²⁴，如上述章太炎1906年的東京演講中提到「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3)當時用「神經病」一詞說人，有時並非特別奇怪，而且語義是複雜的，須視脈絡而定。本文將章太炎的「神經病」主要放在二個脈絡裡來看，一是作為一個「革命者」，一是作為一個「腦病」患者。

首先，當時革命言論遭遇的驅趕緝拿，革命者作為社會壞分子的

19 《申報》第14706號，1914年1月14日，第2版。

20 〈浙江官請保護章太炎〉，《申報》第15065號，1915年1月16日，第6版。

21 如陳平原、杜玲玲編(2009)中多篇文字提及。

22 如孫文也曾被章惹惱過，說「章太炎又發狂攻擊。」（孫文 1986〔1909〕：429）

23 例如說「章瘋子這個綽號，是無聊的小人加到他頭上去的。」（劉文典 2009〔1957〕：53）「我是不大相信章瘋子那一類的傳說的，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們的問學，態度非常謙和，和家人父子一樣說家常話，並不擺出什麼大學者的架子；從康有為那兒看了天才的面孔，再回想太炎先生的態度，可以推想乾嘉樸學家的沖和模樣，愈覺其可親。」（曹聚仁 2009〔1937〕：241）「杭人輕薄，以瘋子呼之，是瘋于學者也。」（沈從民 1985〔1936〕：2687）

24 例如曹亞伯憶述馬君武稱章太炎及他為「章瘋」、「曹瘋」，意指口誅筆伐「作救民救國之聲。」（曹亞伯 1985〔1936〕：2701）

不見容於固有秩序與親師人際網絡，「言論恣肆」絕非浪漫化的疏狂豪邁，而是被視為「亂黨」煽動秩序，在被逮捕的縫隙中求生存，或不得不生存。當時革命情感與知識生產的語境，與當今學院學術史的生產語境，迥不相侔。

1902年章太炎第一次逃往日本，是在學校言論檢查的脈絡下，不得不走，我們可注意以下記敘引號中的用詞：

一九〇二年元月，江蘇巡撫恩壽赴學校查問，晤英美德籍校長，謂有「亂黨」章某借學校煽惑學生作亂，「言論恣肆」，要求許予逮捕。傳教士急遣使通知介紹人吳君遂，吳又遣力走赴餘杭，告以蘇撫尋問，因倡言革命，擬追捕。懼有變，亟往日本避之。於是章先生東渡。（沈延國 2009b [1984] : 292）

1903年，當章太炎因《蘇報》案入獄時，以當時《申報》的報導為例，「章炳麟」是一名狂妄悖逆的惡徒，以擾亂秩序的壞形象被認知、被禽捕、被懲處。我們觀察《申報》對《蘇報》案的報導，一開始「章炳麟」是許多嫌犯人名之一，並非主要人物，例如，1903年7月2日報導描述了他如何與其他入等被一併禽獲，如何以羞辱的體態被強行制服，完全就是社會新聞版裡奸惡劣民的身體與行為：

……章炳麟……等人，因飭差役李元持票投租界領袖美總領事署，稟請簽字，隨倩捕頭派出中西探捕，偕往三馬路《蘇報》館，將陳等五人一併禽獲，暫押捕房。……陳等咸植立案前，英總領事署迪繙譯官喝令跪下，諸人不服，相率蹲踞於地，迪君嗤之以鼻，令屈雙膝，諸人知不能再售其奸，乃始帖耳而服。（《申報》第10847號，1903年7月2日，第3版〈會黨成禽〉）

7月3日對於革命會黨的報導，則使用了「繆說」、「煽惑」、「大逆不道」等字眼，「飭拿懲治」是他們面對的處置；連生病就醫也是新聞，接受醫療時，警力「帶火槍日夜輪流看守」：

……章炳麟……等人膺聚其中，結為國民會社，專以排滿革命諸繆說煽惑各處學生，事為兩江總督魏午帥所聞，奏奉諭旨飭拿懲治。（《申報》第10848號，1903年7月3日，第3版〈續獲會黨〉）

日前革命黨鄒容、章炳麟二人在福州路老巡捕房押所忽患紅痧，經西醫驗明，送至虹口司考脫路工部局病房醫療，并由捕頭派令三畫西捕二名帶火槍日夜輪流看守。（《申

報》第10941號，1903年10月4日，第3版〈黨人患病〉）

蘇報館主筆革命黨首章炳麟、鄒容（筆者按：原文如此）等六人大逆不道一案……（《申報》第10982號，1903年11月14日，第3版〈稟請啓封〉）

後來甚至有報論慨嘆章太炎等主張革命者是「犯七作亂若口頭禪，爭地殺人作遊戲事」、責其「全無心肝」之餘，竟歸咎於出洋留學政策，而建議日後改派官吏出洋，不要再派學生出國留學：

……又未幾而鄒容、章炳麟更作報恣為狂言，不曰滅清掃胡，即曰弑君易代，犯七作亂若口頭禪，爭地殺人作遊戲事，噫，若輩其真全無心肝者乎，奈何訛謬猖狂若此也。或曰出洋留學之弊既如此其深，出洋留學之人又如此其妄，此後當由大吏奏明禁止，或尚可以挽惡習而息頹風乎。……章炳麟何莫非年逾而立，學問優長，猶且悞（按原文如此）入歧途，沈迷莫反，身家性命類皆視若弁髦，惟是異說爭鳴，醉心流血……此我所以謂遣學生不如遣官吏也……（《申報》第11349號，1904年11月19日，第3版〈闢革命復仇說〉。粗體為筆者所加。）

「狂妄悖逆」並不是風格型的、傲人的天生反骨氣質，而是因思想言論而招惹到的社會烙印，身體是被緝拿的對象，人格是被賤斥的難堪：

觀夫鄒容、章炳麟輩刊行逆報，一經華官照會捕頭，即嚴密查拿，可知此次華官特佯為不見不聞，否則西員夙以維持風化為心，庸詎有租界中出此狂妄悖逆之人而不欲作鷹鷂之逐者。（《申報》第11352號，1904年11月22日，第1版〈又安租借篇〉。粗體為筆者所加。）

及至下獄，在獄中受到與看到的凌辱，已經不是「常人」所能想像，何況身受：

獄事既決，獄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時猶閉置空室，未入鐵檻，視獄卒陵暴狀，相與咋舌裂眦。……既入鐵檻，余斷食七日不死，方五六日所，稍作效，必嘔血數刀圭。因憶周亞夫事，非必由憤懣致之，蓋不食則血上溢也。同繫者告余曰：「斷食七日不必死，有素嗜鷄粟膏者，眩掉嘔瀉，絕粒四十二日，猶故不死，況於彼為六分之一耶？」因復進食。然所食皆麥飯帶稗，日食三合，粗糲鯁會咽，顧視便利，則麥復帶稗而出，其不能輸精成血可知。同繫五百人，一歲死者百六十人，蓋三分而瘦斃其一矣。余復謂威丹曰：「食亦死，知必死，吾有處之之道。」自是獄

卒陵藉，余亦以拳擬之，或奪其椎。固自知力不逮，亦太暴，卒遭獄卒踉蹌二次。印度人尤甚，每舉足不擇腰脊腹背，既仆地，則數獄卒圍而擊之，或持椎搗其胸間，至悶絕，乃牽入鐵檻中。以傷死者，甚或眾，既無檢尸具結之事，故恣肆無所顧忌。或時為醫生檢得，則罰金四五圓耳。而獄卒復造私刑為鉗制計，其法以帆布為梏，反接兩手縛之，加以木楔，名曰軟梏。梏一小時許，則血管麻木，兩臂如針刺狀，雖巨盜弗能勝，號呼宛轉，聲徹全獄，其虐較拶指為甚。凡獄囚與外交通書札，則以此鉗制之，故暴戾之狀，不聞於外。余復受梏三次（自去歲上海罷市後，白人危懼，囚者始得稻食，獄卒陵暴，亦稍衰矣，而軟梏至今猶存）。由今思之，可以致死者數矣。威丹略解英語，稍與委蛇，未羅斯酷，而威丹竟先余死，嗚呼哀哉！……威丹既歿，白人稍善視余，使任執爨之役，因得恣意啖食。余之生，威之死為之也。……（章太炎 1977e [1907a]：253-255）

章太炎在獄中絕食七日沒死，斷食五六日時嘔血，他這才明白嘔血不一定來自情感意志上的憤懣，而是不吃的身體反應。絕食後獄友以過去實例告訴他：不吃不一定會死，於是他又開始進食，但吃的粗食原樣排出，根本無法吸收。眼睜睜看著獄友一年五百人死去三分之一，他領悟到吃也一樣會死，於是獄卒陵虐時就不自量力地反抗，遭獄卒腳踢加軟梏，聽受梏刺的獄友哀號聲徹全獄。在章的這段記述裡，絕食與決定再進食都沒有連結到意志，而是一樁關乎活下來或求死的身體反應。然而最後能存活下來，章太炎感念是鄒容的死換來的，他說因為鄒容疑似被毒死，也許在輿情壓力下，白人改善了對章的待遇，派他擔任燒飯工作。章後來在訪談中憶及同時下獄並在獄中曾一室縫衣的鄒容不堪牢災瘋癲了：

鄒容在牢時，容色甚悴，若瘋若顛，夜不寐，大聲罵人。旦問之，渠似不知，人謂渠有精神病。牢中每星期必有醫生來察視，犯人有病，則為之治，病甚者由醫報告，送入病院。鄒容病急時，已許某日某時出獄矣，先一夕服醫生藥，遂死。故外間生疑，多謂遇毒。（張庸 1977 [1912]：263-264）

從章太炎與鄒容在獄中的折磨看，革命與瘋狂的關係，不止是修辭性的隱喻，革命就是身為瘋狂，也是被逼成瘋狂身體的過程。

除了「革命」的瘋狂，章太炎的「神經病」，也令人不得不聯想

到他的「腦病」²⁵。他在六十一歲時寫的《自定年譜》中說，自幼多病，十餘歲時除了「竊窺」家中《東華錄》等藏書，也循俗為場屋之文。回溯生命軌跡的敘事，通常會在一定的主題下，講成自少小就命定朝向某一特定方向邁步，但離開特定的敘事脈絡，章太炎自道生命歷程中的事件時，經常也會點出偶然性成為不得不然的人生事實。例如上文提及章太炎在東京的演講及其他諸文，回溯自己革命念頭之緣起，經常溯及少小時讀《東華錄》有感，但民國後在某次訪談脈絡下張庸問他：「人言先生八、九歲時，即有革命思想，然否？」章太炎就離開革命的敘事脈絡，從生命旅程的偶然性著眼說：「是或有之，然少年非有一定宗旨也。」（張庸 1977〔1912〕：259）這當然是更符合人生之實際的。光緒九年(1883)，章太炎十六歲時，也與一般青年一樣，照常奉父命赴縣應童子試，不料卻因「眩厥」而應考未成，從此父親命他不再參加科考。章太炎對於生命沒有循俗走上科舉之路，也只說是生命的偶然，亦即《莊子》所謂「適然爾」，並不將自己的故事說成天賦異稟從小立志不應科考。²⁶

章太炎各種著作似乎很少特別對於此病發抒心情，章太炎只說「眩厥」，並沒有指明病名，但在親朋或其他學者的記敘中，則稱之為「癩癩」、「癩疾」、「羊癩」²⁷或「腦病」。我們考察各種相關紀錄，病之於章太炎，這個生命偶然，確實已經讓他不得不逸出了原先的生命軌道，並成為他認為值得標誌在年譜中的具有轉折性的事件。不是故意，而正如他自己的詮釋，就是生命偶然性之「適然」，也是不得不然。在他的回憶中，此時開始「涉獵史傳，瀏覽

25 按「腦病」也是19世紀新興詞彙與觀念，據張寧研究，「原先在中國傳統醫學歸因於心的一些病症，包括中風、癱瘓、麻木、發羊吊、思慮傷神、狂症、癩症、痲症、頭痛、頭暈等」在合信、陳脩堂同撰之《全體新論》（廣州：惠愛醫館咸豐元年新鐫，1851）引入「腦為一身之主」的概念後，就都歸因於腦或脊髓。（張寧 2011）

26 章太炎：「予少時多病，時文亦弄過，旋即廢棄，未應試也，然亦適然爾，非有意為之。」（張庸 1977〔1912〕：259）。

27 馬敘倫：「其幼病羊癩，故不能應試。長亦獨慧于讀書，其于人事世故，實未嘗悉也。出門即不能自歸。其食則雖海陸方丈，下箸唯在目前一二器而已。」（馬敘倫 1991〔1948〕：43）

《老》、《莊》」（《自定年譜》光緒九年十六歲）、「初讀四史、《文選》、《說文解字》，自是廢制義不爲」（1884年，十七歲），直到十八歲（1885年），章太炎還特別記下自己「眩厥未愈，而讀書精勤」，讀書內容走向古老的經學：「壹意治經」，文章也遠離了時文：「文必法古」。章太炎《自定年譜》在光緒22年(1896)記錄了與康有爲齟齬的模糊端倪，次年則批評康、梁新學：「時新學初興，爲政論者輒以算術物理與政事并爲一談，余每立異。謂技與政非一術，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援其術語以附政論，余以爲科舉新樣耳。」這個論點一方面表達的是一種與時人（即使是時人中的革新者）格格不入而每每立「異」的氣質，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也是章太炎記錄自己讀書內容及方向的差異，造成的與時代的齟齬。這個齟齬，也是來自「多病」的生命偶然性，他說，「予小時多病，因棄八股，治小學，後乃涉獵經史。」（張庸 1977〔1912〕：259）《自定年譜》中追溯自己少年以來讀什麼書，其實在勾勒自己之所以「異」的軌跡，而放在章太炎成長年代，那個19世紀末新舊交替的時代，而今學界咸認爲「中國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參考王汎森等 2007），交待自己「讀什麼書」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刻劃自己如何參與現代世界。算術物理這些學問，19世紀末以來漸漸被進步人士認爲應該加入制度性的教育中，在學堂或新式學校中該學什麼，漸漸成爲改革維新士子關心的議題（孫慧敏 2007：81-98；范廣欽 2007：108-133）。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中，章太炎的「治小學，涉獵經史」表明的已經是一種讀書方向上選擇「倒退」，而非如當時新學者流以自己並不十分專精的新興科學與技術語言附會時論時政。其後〈自述學術次第〉說：「爲文奧衍不馴，非爲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訓，復用于常文耳。」（1985b〔1913〕：2656）章堅持讓古言古字在現代日常生活仍然生發活力，並且新字要沿著歷史軌跡產生：「近來學者，常說新事新物，逐漸增多，必須增造新字，才得應用，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學，造出字來，必定不合六書規則。」（1906a:11）語言文字學以及古代典章制度等學問專長用在革命上，放在章太炎「提倡國粹」的呼籲脈絡，他想說的，不過就是情感上的「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9)而且是從當時現實的知識參考座標中所選取值得投資的合乎某種理想的特

定歷史：「我們今日崇拜中國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會主義。那不好的，雖要改良，那好的，必定應該頂禮膜拜，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13)在這裡，「中國的典章制度」與當時新傳布的「社會主義」並置，而「社會主義」是「我的社會主義」，也是章太炎所認為的「中國一切典章制度，總是近於社會主義，就是極不好的事，也還近於社會主義。」(12)

除了上述因眩厥從此不再走科考之路造成的差異，章太炎的婚姻也因此逸出了常軌。現存章太炎《自定年譜》有手蹟本的《初稿》及《清稿》本，查《初稿》在二十五歲、二十六歲二年都空白未著一字，《清稿》始在二十五歲那年未預留空行的罅隙行線上補入「納妾王氏」，二十六歲補入「女姦生」。應是初稿時並沒有想要寫納妾生女之事，也許不知如何寫，也許這事有意無意很難立刻浮現在他想要流傳後世的《自定年譜》裡。當時他並沒有行婚禮，此時也尚未有妻室，何以未娶妻而納妾生女？據他的好友章士釗(1881-1973)²⁸的說法，正是由於癲疾：

近世章太炎未娶，有女子子三人，蓋太炎幼有癲疾，家人不為娶妻，遂私婢而得子。（章士釗 1971〔1965〕：328）

其長孫章念馳甚至說因自幼反清言行與癲癩病而「無女願嫁他」：

太炎先生青年時代就有反清言行，加上自幼有癲癩病（成年以後癒），25歲，無女願嫁他，故他母親便將自己陪嫁丫頭王氏許配給太炎先生，因這種婚姻沒有當時的媒聘婚禮，故不能算正式結婚，只能算「納妾」。因此太炎先生在《自定年譜》「1892年25歲」一條中，只稱「納妾王氏」。但是他們尚屬恩愛，王氏也一直支持太炎先生從事革命，還為太炎先生生了三個女兒。（章念馳 2011〔1994〕：48）

這段引文有二點值得注意，其一是關於章太炎的癲癩，家人的追述似乎頗想強調他只是早年曾患過，後來就痊癒了。如女兒章姦(1897-1992)也曾說：「父親在母親體貼入微的照料下，不幾年，他的舊病癲癩就霍然而愈，不再重發。」（章姦 2009〔1985〕：99）但其實他

28 湯國梨口述，胡覺民整理：「一九〇二年，太炎與張繼（浦泉）、章士釗（行嚴）三人在上海為義結金蘭的盟兄弟。」（胡覺民整理 2009〔1981〕：79）

人追憶文字多少都提到章太炎後來癲癇發作的事²⁹，例如馮自由曾憶述：「壬寅（筆者按：1902）春……遂再東渡，受任廣智書局修纂，與余同稅居東京牛込區某旅舍。先生宿患羊癲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門即昏厥于地。余爲之延醫診治，一日而愈。」（馮自由 1985〔1936〕：2699）上海出獄後在日本似是章太炎壓力頗大的一段時間，準備籌錢到印度爲和尚也在此時，並曾因腦病發作而暫辭《民報》主編職務。這段期間，也是他潛心從事醫學研究的時間（章念馳、潘文奎 1994〔1988〕：4-5；錢超塵 2009：283-285）³⁰。較晚的記述如：「當時先生身體漸漸孱弱，從大公子導結婚那天，先生竟突然昏過去了。」（沈延國 2009a〔1946〕：328）家人「後來就痊癒」之說，若出自有意爲尊親諱，顯示至少在家人的感受中，腦病眩厥具有一定程度的污名，但也可能家人與章的親密關係並不包含知悉這個部分³¹。其二是關於王氏何以稱「妾」，我們發現，名分總也同時是身分階階與觀點的問題，對於王氏的女兒來說，王氏當然是妻室，後來章太炎與湯國梨的正式婚姻則是「續弦」。所謂的「妾」，在章太炎與王氏次女章葳的憶述中，實則正妻，而章念馳所謂的「尙屬恩愛」，在章葳的筆下，也更能讀出壓抑而複雜的家庭情感政治，以及關於細緻複雜之家庭生活敘述的含蓄修辭，章葳說：

29 直到去世前一年仍有昏厥之說，如馮自由：「是日（按：1935）稱觴後，太炎忽在禮堂昏厥，須臾清醒，眾從後掖之。」（馮自由 2009〔1943〕：27）但不確定此昏厥緣由。

30 章太炎另一段醫學著作旺盛的階段是1923年後。

31 非常感謝匿名審查人之一在這裡提供了更細緻的觀察與閱讀：「從歷史上來看，『癲癇』作爲病症向來帶有強烈的『污名』色彩，對於患者、患者家屬及社會大眾皆然。本文雖已就此面向作了初步處理，然而，對於章太炎僅用『眩厥』形容自己、家人提及其『癲癇』但強調後來已痊癒，以及旁人不避諱地談論章太炎的『癲癇』屢次發作，這三者之間在心態上的不同層次和細微差異，似乎仍有可進一步言說的空間。」我想，審查人的閱讀已然是一種鞭辟入裡的分析了，謹此致謝。以下補充當時對於「癲癇」的若干用法，如「同姓爲婚生子多病癲癇」（1902，〈論中國整頓蠶桑宜先設養蠶學堂〉，《皇朝經世文四編》卷二十三），及「泰西史家言法蘭西當大革命時代，全國所產嬰兒，率多癲癇。」（梁啟超 1966〔1904〕：11）等文化裡的一些污名用法是有跡可循的。而就章太炎個人來說，他對於「病」的關係，則是複雜的，包括他的醫學論點以及生命態度。

父親自幼體弱多病，但很好學。祖母疼愛這個小兒子，決意要給他娶一房賢德的妻室。幾經物色，終於從海鹽找到了我母親，一八九二年祖母給父親完婚。（章竅 2009〔1985〕：99）

對章竅來說，母親王氏是祖母為父親精心挑選的「賢德的妻室」。而她對於日常家庭生活充滿擠壓折磨的敘述，則動用了溫柔敦厚的正典家庭敘事常規，來修復一個實則逸出正典之外、兼具多重低下位階之「革命黨人的妻子」所遭受來自社會與家族的苦待：

母親王氏，浙江海鹽一個貧苦農家的女兒。當時我家也不富裕。母親安於貧苦，忍勞忍怨。父母感情篤厚，相敬如賓，一如孟光梁鴻的故事。……母親只育女不生男，兼因她是革命黨人的妻子，經常遭受來自社會的和家族中的歧視和冷遇。我母親默默地經受住這些精神折磨，而是更加勤儉持家，細心撫育我們姐妹，挑起家庭重擔，免使父親有後顧之憂。大約是一八九九年，父親在日本生病，母親得知消息，心急如焚，急忙籌盤費，攜著七歲的大姐和兩歲的我，身懷未出世的三妹，遠渡重洋，來到父親身邊。我七歲那年，母親一病不起，雖經多方診治，終因為了父親參加革命，為哺育我們姐妹，為一個家庭的操勞，耗盡心力，溘然長逝了。這時是一九〇三年。（章竅 2009〔1985〕：99）

清政府在戊戌政變(1898)之後風聲鶴唳地整肅「論議政事」者，章太炎在「群情惶瀟」（《自定年譜》光緒二十四年）的政治氛圍中，秋冬時逃到台灣避難。章在台灣相當鬱悶，對「蒸濕」的氣候，以及他認為「少士大夫」的環境都不適應，半年就「意興都盡」了。在這鬱鬱不樂的半年裡，王氏也在身邊。隔年五月章太炎到日本，起先家人未同行，不久章就病了，懷著身孕的王氏籌措旅費，帶著七歲的竅，二歲的竅，趕到日本照顧章太炎。章竅在短短的回憶文字中，特別提及1899這年章太炎在日本生病、母親懷著身孕東渡日本的事，當時她僅二歲，應該不是自我的記憶，而是後來家人間述說的難忘的共同記憶。字裡行間呼之欲出的是一個革命者家人日常生活與生命共同付出的代價，「精神折磨」四字道盡了一個低社會位階、不生男、丈夫又是逸出秩序系統之外之「革命」者的貧苦女人所承擔的「歧視和冷遇」，而最後重提母親「為了父親參加革命」而為家庭操勞耗盡，則使得「父母感情篤厚，相敬如賓」六字顯得近乎魔幻，暴力而殘忍的辛酸。章竅感念母親的忍勞忍怨與承擔，可以讀成是一個革命者家

庭成員艱辛存活下來而對於「歧視冷遇」之溫柔敦厚的原諒，然而這個敦厚的原諒，也使得歷史書寫較容易忽略那些歧視、冷遇與社會政治總體秩序對革命者的懲處。章太炎1913年四十六歲娶妻湯國梨，湯曾憶述她自己原想「在結婚之後，對文學方面，向他有所討教。無如婚後的章太炎，漸以夫權凌人。始知其已逝之妾王氏，雖與生有女兒三人，稍不遂意，即遭其凌辱。所以太炎除老、醜、窮，脾氣也很壞。」（胡覺民整理 2009〔1981〕：71）這個敘述我們可以理解為社會所擠壓的身分（「鬧革命」、「神經病」、家境貧窮等）在家庭親人關係裡所承擔的艱辛壓力。湯國梨年輕時即為活躍的反帝反封建女青年，曾籌畫活動為組織女子北伐隊募款，也辦過女報，雖以「夫權凌人」的女權話語批評章太炎在家裡的表現，並同在「女人」的位置上為王氏抱不平，但從相關記述看，成為章夫人之後的湯國梨也一直辛勞擔任後勤內助角色，一起承擔著沒有富貴的革命者後半生身體與家庭的艱難，湯國梨使用了當時新興的女權話語，王氏的女兒則使用傳統賢妻良母話語，二人共同承擔的，距離並沒有想像的遙遠。

二女兒章玆存活下來了，留下了難得的回憶文字，而章太炎的另一個女兒，長女玆（1893-1915），則成了沒有活下來的鬼魂，留下的是章太炎對她的回憶：〈亡女玆事略〉。玆二十三歲那年，1915年9月7日晚，上吊自殺³²。從章太炎〈亡女玆事略〉看，章太炎注意到的是這個女兒平日強迫症似的潔癖，以及憂鬱症般的性情，章太炎似乎早已注意到她有抑鬱自殺的傾向：

玆性狷好潔，平居衣履有小褻垢，必鬻蹙刮治之。……獨時邑邑不樂，常欲趣死。余數遇禍，而寶銓亦時快鬱。（章太炎 1985c〔1915〕：198）

〈亡女玆事略〉一文開始便提到這個女兒「生十歲喪母」，而當時章太炎「適以事遭胡清逮捕」，此即指1903年《蘇報》案，章太炎被監

32 章太炎的妻湯國梨則以現實原因解釋章玆之自殺，認為是袁世凱軟禁章太炎時去看望父親造成的壓力：「太炎被囚在錢糧胡同時，女兒章玆（已故前妻之長女），適去京省視老父，後悉此舉恰恰無意中落入袁之圈套，非但將致老父於死地，即自身亦陷入絕境，遂於八月間自縊身死。」（胡覺民 1981〔1980〕：58）

禁三年，焱因此受伯父照撫。短短一篇追憶亡女的文字，章太炎似乎將女兒的自殺解釋為某種必然，因為從小看著身邊的人死亡或遭難，從十歲母親死亡，到父親入獄，到十七歲嫁給也是革命同志「不甚循禮法」（章太炎 1985d [1922]：200）的龔寶銓，「亦數離患」、「怏鬱」、「顛沛」，章太炎說，焱從小親睹親人友朋故舊的死亡與「無窮失據之狀」，「其厭患人世則宜然」。章太炎記得這個女兒平常言笑無異狀，卻是常想到死，而死後的容顏章太炎反而莫名其妙地感覺到她歡笑了³³：

比歛，顏色更如歡笑者，此曷為而然者耶？（章太炎 1985c [1915]：198-199）

身為一個神經病革命者，章太炎當時的生存處境其實幾乎是經歷艱難的社會賤斥的。章太炎除了曾被老師俞樾指責為「不孝不忠，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章太炎 1979 [1901]：121），族人也會「在余杭家祠中開了全族會議，將太炎開除出族。」（汪榮祖 2008：3）湯國梨口述提到：

太炎被囚於北京時，我隻身在上海，因無人可以商量，曾派家內勤雜工壽榮專程去杭州，擬請太炎伯兄章錢到上海或通信交換營救太炎的意見。不料章錢及章氏族人因太炎早年剪辮斷髮，投身革命，三十七歲時，為鄒容《革命軍》作序，昌言反清，下獄三年；後被逐出國，鬧得全國聞名，人稱章瘋子，今又被囚，他們恐受牽累，已在餘杭家祠中開了全族會議，將太炎開除出族。所以壽榮去見章錢，進入大門後，即被命站在天井中，不准進入室內，並對壽榮說：太炎被捕，家族無能為力，且恐禍及全族，已將他開除出族了。（胡覺民 1981 [1980]：57）

章太炎這位伯兄章錢，因無子嗣曾經領養撫育章太炎的次女章焱（《自訂年譜》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蘇報》案時也幫忙章太炎照撫女兒。汪榮祖把章太炎的「謝本師」以及族人的劃清界限，解釋為章太炎的自願切割以「保護」老師及族人，這說法是值得參考的：

33 章太炎後來給三女章珪的信中寫出了感受的另一面：「汝姊之死，固由窮困，假令稍有學業，則身作教習，夫可自謀生計，何至抑鬱而死也。」（章太炎〈與章珪〉，馬勇2003：612-613）

「倉前故居的族人爲了自保要跟他『劃清界限』。太炎本人對此非僅沒有怨言，連提都不曾提過。像他這樣俠義柔腸式的人物，會在乎這些嗎？」章太炎文章罵過光緒皇帝，罵過袁世凱，罵過孫中山，罵過當時權貴與名人，但沒有抱怨過家人。汪榮祖又說：「其實，早在蘇報案時，他的倉前族人已表明立場，長兄炳森易名爲章籛，仲兄炳業易名爲章箴，向官府報備炳麟已被出族，以後兄弟罪不相及。據說太炎撰有《炳麟別族記》一文（作者未見），若然，則太炎亦自願『別族』以保護族人，就像他寫〈謝本師〉來保護他的老師一樣。」（汪榮祖 2008：3）長兄章籛去世後章太炎作〈伯兄教諭君事略〉，刻劃出一個恬靜方直的長者。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太炎強調他「對僕隸未嘗大聲色」（章太炎 1985e [1928]：197），並提及章家三世知醫，而章籛「尤精」，貧家子弟求醫必應，全活甚衆，但卻非常謹慎於醫術不爲權貴利用：「然未嘗以技自暴，懼爲顯要役也。」（ibid.）本文引述章太炎被開除出族之說，不在於指責章太炎族人，而在於試圖呈現當時革命者連帶家族所承受的社會擠壓，以及親友之間委曲求全的艱難。

關於章太炎的「瘋」，另一面向的記述是他日常生活與言行的疏脫，由於轉述者衆多，許多軼事像是名人雅士的不拘小節，本文不擬多引。在此僅引一則憶述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的客居生活軼事。當時章太炎住劉師培、何震家，在劉師培外甥後來的一段記述裡提到：

章先生囚首垢面，衣巾經月不浣。養松鼠於袖中，果殼和乾肉狼藉，室內蟲蠅飛擾。又夜斥下女，繼以號哭，旋復高歌，舅母（筆者按：指何震）不能堪，噪逐之。先生逡巡出，入小旅舍。外祖母以爲同在客中，宜相照顧，曉舅母以大義，命舅氏迎之歸。故先生見外祖母，必致敬禮，與舅氏親若昆季。乃未久，以論學及政見不同，聞其中有奸人播弄，遂略有齟齬，是年即歸國。（梅鶴孫 2004：37）

如果細讀章太炎自幼從革命言論所引發的社會性的對他身體性的羞辱懲處，那麼，這裡日常生活的髒與亂、居室的蟲蠅飛擾，就不是名士型的心不在焉，加上夜裡斥責下女、又號哭又高歌，讓同住的朋友再也不能忍受而把他趕出去，呈顯的也許更是神經病革命者情緒與身體的自我擠壓，他的「被驅趕」不僅是政治法令上的，同時細緻到日常身體生存的方式。

三、「神經病」作為論述位置

章太炎呼籲「要把那細針密縷的思想，裝載在神經病裡」，從本文看來，對章而言，「神經病」的身體位置，其實與知識及學問密切相關，也許可以說是一個認識論的位置。選擇的知識型態，也許總已經是自我處理被棄絕或被消滅的威脅、或被處置、或被囚禁的某種生存性還擊，而這種身體性的感知，也正是他社會實踐以及理解歷史或知識學問的基礎。章太炎曾說：「古人的學說，多半是跟著自己的一種意志來的。例如朱子他們的學理，多半是謹小慎微，優遊寡斷，在做地方官及當紳士，原是可以的。若王陽明的學說，他是主張果斷的，他的學說拿來用兵，是最適宜的，因為王陽明原來少年時代，就喜歡帶兵，故他的學說，是跟著他的意志來的。其餘諸子的學說，多半如是。」（章太炎 2011a [1920]：205）這裡「意志」應是指性情取向，在章太炎的觀念裡，身體情感性的意志，與思想知識性的學說取向，是有關連的。我們從這個觀點看章太炎與康有為在政治立場與學術思想上的差異，基本上也正是某種「意志」的不同³⁴。

34 關於康章學術及政治立場之異同，學界研究已多。過去許多學者主張康章政治立場之爭為經今古文之爭（相關文獻回顧可參張昭軍 [2002: 4-6]）。這是在儒學經說家法範圍內的意見，但章太炎1933年憶述自己治學過程，提起當年公羊之說如日中天時他「專明左氏以斥之」，就分了層次，他說：「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康有為倡改制，雖不經，猶無大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視春秋經如預言。」（諸祖耿 1985 [1936]：2726）本文對於晚清知識分子學術的理解，主張不從既成的學術分類來安裝，以免削足適履。相關主張在筆者〈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一文中亦提出：「此時知識分子針對當時現實所作的批判性反思並不是抽象地追隨或回應任何一家學說，因此無法用儒、佛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等任何單一框架來理解，可能內容或語彙與許多既有學說也都有著呼應或借用的關係，與特定學說之間也一定有著矛盾衝突的關係，因為他們思考的並不是任何單一學說本身，而是當時複雜的現實與理想的未來問題。」（劉人鵬 2011：48-49）中國自19世紀末起開始零星引介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觀念，有時也不刻意區分這些主義的立場，事實上，這些主義當時在世界各地也以不同的面目出現，不論思想或行動都是現實中活生生的實踐，可能充滿著內部矛盾與衝突，並非後世單一學科思想史歸納的完整學說。（劉人鵬 2011：35）不論康或章，在他們的時代裡，面對的是思考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在學

汪榮祖《康章合論》(1988)一書曾經指出，康章之爭不應約化為經今古文之爭，也非變法與革命之分，該書提出一個對於康章思想之異趣的重要洞察：汪認為，康有為「先天性情與學術背景都有利於『屬於世界性觀點』的鑄造。他胸懷宇宙人類，故能『推惻隱之心，以行吾仁』」(36)，汪榮祖指出，康相信並主張世界公理，認為「不應因帝國主義而反對近代文明，而應以近代文明為變法圖強的資本」(44)，而章太炎則注重歷史意識，強調文化的特殊性，吹萬不同，無法統一於一尊，而主張「不應讓近代西方文明征服各各不同的文化」(61)。本文同意汪榮祖這個觀察。如果我們對於康章學術的認識不局限於現成學說，而著眼於當時對帝國主義現代性的回應，這個觀察的確掌握到一個重要關鍵。只是，本文再把視點縮小，聚焦於對「神經病」的態度而另作分析。從「如何對待神經病」的觀點，大約可分別二種論述位置的投資：一是對於普同性的進步、道德、文明、健康之完整、一統性的位置，另一則是暫稱為「神經病」的帶有負面性、特殊性、甚至已然具有病理性、污名的位置。這裡「神經病」當然不意味著不嚴謹或非理性，章太炎一向對於學術的執著認真與強迫症似地不斷細部修改，正可以說明。本文的脈絡中，「神經病」大約指向在強迫進入現代性時，在追求「正常」秩序與文明進步、甚至學術與世界完整統一性的慾望裡，想要被處置或消解隱藏的一個位置。本文試圖分別的是兩種認同或投資位置，「聖人」與「神經病」作為生存與論述位置，而不是日常對於人物行止或精神狀態是否端謹正常的判斷或趣味性的形容。因此，即使我們看到康有為青年時歌哭無常，旁人也「以為狂而有疾矣」（康有為 1992：8），但這所指的卻是康

院或書齋裡寫作忠於學說家法的論文。章太炎本身對儒學充滿複雜度以及對於時勢變化的回應，至今仍是學者探討的課題，而他對儒學以外其他諸子如莊子、法家，以至佛學、小學等的研究，並不是如同今日學術刊物審查機制下所生產的論文，很多是成形於當時為革命運動而開創的回應或改變現實的刊物或講學場域。他的思想除了與傳統經史子集對話，同時也回應著當時新興思潮如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例如〈五無論〉），無法依據當今學院科系分割後的知識範圍，用現成學說一言以蔽之。另外，從政治立場或路線的角度看，康章之爭也不盡是個人的，我們從當時《民報》諸多對於康或梁或《新民叢報》的批駁，可見清晰的政治路線差異。

「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8)這個旁人同樣名之為「狂」或「有心疾」的狀態所投資的，卻是那個具有普遍性、一體性的「聖人」論述位置³⁵。

這個論述位置的不同，有時也會影響到敘事或閱讀，例如前文提及章太炎在1906年的演講中指盧梭為神經病，盧梭的故事已見於1902年《新民叢報》第七號「名家談叢」之〈盧梭狗〉條，但在《新民叢報》的故事脈絡中，強調的是盧梭見「小犬為大犬所凌噬，不堪其虐」因而發怒驅逐大犬，文末且謂「若盧梭者可謂聖人矣」(86)，亦即，章太炎聚焦並命名盧梭這行為「神經病」，不避諱不正常、不神聖的語彙，並賦予新意義，但《新民叢報》則是將故事含納到神聖化的敘事框架中。另外，俾斯麥的故事亦見於《新民叢報》第七號「雜俎」，但敘事勾勒出的是一個理智的俾斯麥，他要屋主設鈴，屋主傲然要俾斯麥自行出資設之，於是俾斯麥從容以槍聲叫人，令主人無奈而設鈴(90)。但章太炎讀到的俾斯麥，卻是何等「神經病」的性情。

章太炎好幾次批評康有為，都特別指出康自稱及被稱為「聖人」。1897年康有為在廣西創設「聖學會」，刊《廣仁報》，那年章太炎文中就提出「聖人」二字批評：

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蝮蟻轉丸，則不得不大聲疾呼，直攻其妄。(章太炎 1977a [1897] : 14)

又如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1903)中批評康有為：

尊稱聖人，自謂教主，而猶為是妄言，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乃較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為尤甚。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章太炎 1977d [1903] : 194)

據相關記載，康有為的確自幼便自我投資或被投射於「聖人」這樣的符號，例如梁啟超在〈康南海傳〉裡的描述：

35 這也與康章著作另一傾向相呼應，康以正面規劃的「大同」來呈現整體的未來，而章則以負面性的〈五無論〉論證規劃一致性完美未來的不可能。章學說的負面性可參河田悌一(1988)。

然家學既正，稟性尤厚。故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爲」。
(梁啟超 1987 [1901] : 3)

章太炎則顯然對於「聖人」極度反感。當然，晚清在「革命」的論述氛圍中，「聖人」不是理想的人格典範，例如馬君武《俄羅斯風潮》的〈序言〉即說：

人間之最可惡者，莫如野蠻時代之所謂聖賢矣。其識見局於社會之中，受社會之等等影響而不可脫卻。故順社會之風潮所趨而立說。不能立足社會之外，以指點批評現社會之罪惡，出大力以改造社會，破壞舊惡之社會，另造新美者。其人又稍有知識，愈於庸眾，其說既出，則萬千之庸眾奉其言爲經典，視爲神聖不可干犯。於是舊社會罪惡之根蒂因之愈固。雖然，野蠻時代之聖賢，在如彼之時代，固不可無，而在文明之時代，可謂之爲大怪物矣。其功罪每每相抵也。（馬君武 1902 : 1）

從革命的觀點，馬君武指出「聖人」的局限在於無法立於社會之外，無能超出社會已然識別或肯定的價值而「另造新美」，既順從社會現有框架，又在知識上稍高於庸眾，庸眾就會奉之爲經典，但這恰恰是使得社會無法改造的罪惡。從主體的觀點看，這其實也是關於生存位置之投資的問題：投資於「聖人」的論述位置者，論述基本上會傾向於以普同性的「仁」道方式安排世界，那麼，仁道想像如何對待廢疾者？以瘋疾爲例，典型如康有爲，在他最理想的大同世界裡，對瘋疾的處置方式就是將瘋人隔離於瘋人島、政府細心照養、但最後目標是令其絕種：

瘋疾者置之特島中而官養之，不許男女同居以絕其種，無俾遺育以亂人種。（康有爲 1998 : 284）

《禮運·大同》篇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其「鰥寡孤獨廢疾」究竟是想像爲社會上具有差異性的身體與主體，抑或僅只是行仁政照顧處置的客體對象，並不清楚。但19世紀末知識分子不論挪用儒家「仁」道主義，或是挪用社會主義、墨家兼愛、佛家衆生平等、或無政府主義，如果有一個整體性的理想大同世界或社會的想像，對於「廢疾」，通常是當作「殘缺者」來處置，在仁愛大同的理想下，以仁道參養之，但期望的理想世界則是廢疾者從此消失滅種：

然大同之世，亦無感瘋之人，亦無傳瘋之種，亦無瘋疾者矣。(284)

以無政府主義詮釋〈禮運·大同〉的《新世紀》〈禮運大同釋義〉也說：

此等鰥寡孤獨廢疾者，不能責其盡力於社會，亦不能同享社會之權利，為進種計，故別之，為好生計，故養之。故曰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鞠普 1908：2)

亦即，廢疾者被視為「一次性」(disposable)的存有狀態，是可供處置的對象，之所以要好好處置照護，要成全的是（「非廢疾者」的）好生之計，或者，在19世紀末是種族的進化或世界的大同等等理想。「鰥寡孤獨廢疾者」從〈禮運〉的「皆有所養」，到晚清此刻被挑明「不能責其盡力於社會，亦不能同享社會之權利」，成為「大同」世界要處理的「異」。這種以非廢疾者為主的仁道照護，從「正常」的思考框架，很難看見問題何在，因為「廢疾」是作為缺陷、不足、無能、甚至對未來有害而想像的，理想世界裡廢疾從此消失亦是理所當然。殘弱廢疾在現代美好的社會最理想的狀態也就是以和平的方式照顧，以至終於消除所有美好所認定的不美好。仁聖論述重點在於聖人和平與仁愛的美德如何看待殘弱廢疾，而不是被視為殘弱廢疾者如何看待聖人與世界；但被認為殘弱廢疾的身體如何看待世界及所謂仁者，正是仁聖論述的空缺所在，必須置換一套論述框架，才可能看到「仁道照護」的問題性。這就是《莊子》所提供的對於仁義道德的批判，以及《莊子》中透過殘疾主體所展現或質問的正常與禮法的暴力（如《德充符》兀者申徒嘉對子產的批評）。《莊子·盜跖》所呈現的大盜針鋒相對批判孔聖，所針對的，就是仁聖論述的空缺，而正因為章太炎從來不投資於聖人論述位置，加上當時種種新學說新視野與身體實踐配合的視野下，章太炎在〈盜跖〉篇中讀到了「盜」的政治立場³⁶。

36 本文之所以特別以章太炎讀盜跖為例，是因為章這個讀法的意義不易被理解，一般研究章太炎「學術」，大約都不會重視這個解讀。本文想指出章所以能讀出「盜」的政治性的若干歷史氛圍，並指出與章對社會、政治、生命的認識立場都相關。

《莊子·盜跖》藉盜跖之口批判仁義道德論述，司馬遷《史記》的讀法早就是從《莊子》的立論位置，將〈盜跖〉與〈漁父〉、〈胠篋〉等篇，讀成是鮮明的「詆訛孔子之徒」（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點出《莊子》「剝削儒墨」的明確立場。宋代蘇東坡、王安石等則從儒家的立場，將《莊子》〈盜跖〉、〈漁父〉等篇，認定為贗品。明清諸多注《莊》解《莊》者，亦多懷疑〈盜跖〉篇的真實性。章太炎則批評蘇軾，而認真對待〈盜跖〉的微言大意：

雜篇有孔子見盜跖及漁父事，東坡以為此二篇當刪。其實〈漁父〉篇未為揶揄之言，〈盜跖〉篇亦有微意在也……東坡生於宋代，已見佛家呵佛罵祖之風，不知何以不明此理，而謂此二篇當刪去也。（章太炎 2011c [1935]：589-590）

章太炎在《檢論·儒俠》中，將盜跖所為，讀成是「今之巴庫寧」，而盜跖之說，為「今所謂無政府論者」，其意在於批判「立君治兵」的統治制度，亦即，設立政治上君臣與國家，又以戰爭租賦等暴力使人民塗炭的政制。章太炎讀書解書，向來不本質化任何觀念或事件，幾乎全是歷史化、建構論。他說：「我講學素不主張絕對的，因為他與社會不相應。……無論教育、學術，要與本身有關係，才可作用。……根本之法只有講歷史，其餘都用不著。」（章太炎 2011a [1920]：207）章太炎同意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並認為史的精華就是「社會學」（諸祖耿 1985 [1936]：2725-2726）。章太炎之所以能在《莊子》裡讀到盜跖其實是一位無政府主義的政治異議人士，除了生存位置的投資不同³⁷，當然也與章追溯歷史裡與正統政治秩序相平行、相抗衡，而為「法」所嚴誅嚴懲的「擊刺」或俠士的傳統有關。那些「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的神經病們（《檢論·儒俠》所謂「疢矣」！）章太炎說，在失去了「俠」作為一種「名」的年代，加上孟、荀等「法訓之士」的學術智慧根本不足以知盜跖，俠很可能就被誣蔑為「盜」了。而〈盜跖〉篇中透過盜跖之口對於孔子之徒為「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妄作孝弟，

37 這裡指不投資於孔聖人的論述位置，而投資於「盜」，並不是指章為無政府主義者，章不認為無政府主義是最後的政治立場，參其〈五無論〉。

而傲倖於封侯富貴」的批評，也正是章太炎對於當時學界革命氛圍的批評：

目下言論漸已成熟，以後是實行的時代。但今日實行上有一種魔障，不可不破。因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強盜有力量，秀才沒有力量。強盜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的上官府，所以強盜起事，沒有依賴督府的心，秀才就有依賴督府的心。前此數年，遍地是借權的話。直到如今，講革命的，也想借到督撫的權，好謀大事，這真胡塗得狠。頗有人說：學界中人，不如會黨；會黨中人，不如強盜。依兄弟看來，知識高下且不必說。但強盜從沒有靠官造反的心，會黨略有數分，學界中人，更加數倍。論他志氣的下劣，與自信力的薄弱，較之會黨、強盜，不免有些慚愧（大拍掌）。（章太炎 1906d：96-97）

除了批判學界人講革命傾向於倚賴現成權勢，志氣與自信力都不如會黨與盜，「綦情利祿，貪著贈饋」（章太炎 1906c：19）一直是章太炎對當時革命者的深重批評，亦即「富貴利祿當面現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章太炎 1906a：3），也就是〈盜跖〉篇透過盜跖之口對於儒者「矯言僞行，以求富貴」的批評。

晚清時論中，對於「盜」有另類看法的固不止章太炎，例如龔自珍有「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龔自珍 2012：3-4）之嘆³⁸。劉師培也曾說：「你看中國古時候的英雄，如陳涉、項羽一般人，大抵都是亡命之徒，到了沒有法子想的時候，出來鬧一鬧，遇著機會，他就可以成功了。大約天下的人，最難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無論什麼事件，都可以出來做。所以古時候的大刺客、大游俠、大盜、大奸，都是出來拼命做事情的。」（劉師培 1998〔1904〕：64）從章太炎此刻對於「盜」的重新評估，反觀他將革命者追求「富貴」視為大忌，以及他將盜跖理解為「今之巴枯寧」，我們必須指出，章之所以批判富貴，不止是儒家孔聖人「富貴於我如浮雲」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君子高超德行，而是《莊子》對於儒徒「僥倖於

38 章太炎類似的評論是：「朝有諛佞，而乏奸雄；野有穿窬，而鮮大盜，士有敗行，而無邪執，官有兩可，而少頑器。方略不足以濟其奸，威信不足以和其眾，此亦惡之退化也。」（章太炎 1906b：10）

封侯富貴」的批判。加上對於「俠」傳統的重構，並且也包含了晚清革命論述氛圍裡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精神思想資源或多或少的借用，亦即，對於社會財富分配問題，以及政治與階級暴力問題的理論化思維。如果從政治暴力與社會財富的結構性觀點看「盜」，當然就不純然是德行問題，章太炎也一直認為「盜賊猶非最無道德者也。」（章太炎 1906c：22）並曾從社會貧富結構性觀點考慮過盜賊之罪輕重的問題：

輕盜賊之罪，不厚為富人報貧者也。（案治盜賊，不當刻定臧數以論罪之輕重，當計失主所有財產而為之率。譬如家有百萬金者，取二十萬金猶無害；家有十金者，取三金則病甚。其為害於人有輕重，故罪亦因之為輕重。不當刻定錄兩以計罪，亦猶傷人者，毀嬰兒一肢與毀大人一肢同罪，或且加重，不以肉之重量面積計罪也。）（章太炎 1908b：12）

這個計算看似匪夷所思，但「盜賊」及「治罪」二者皆被問題化了，而視法律「為富人報貧者」的觀念，也呼應著當時革命論述所引介的部分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巴枯寧在俄國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的脈絡中被引介³⁹，在這個脈絡中，政府、法制、文化機制等都是作為鎮壓的機關而被認識，也清楚看到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作為「政府」的敵人，幾乎都是被囚、被禁、被流放⁴⁰。

對章太炎來說，革命始終是一種歷史化、反抗當前身受暴力的問題，而不是建立普世性大同世界或普世價值的問題，強調「人類本為時間空間所限」（章太炎 1907c：30）。章太炎的革命論，或民族主義，或平等論，都不是從普世抽象真理的角度立論，而是歷史化為

39 例如馬君武於1902年譯《俄羅斯大風潮》，金一《自由血》等都對巴枯寧有所譯介。

40 如馬君武《俄羅斯大風潮·序言》云「無政府黨人者，各國政府之最大公敵也。」（馬君武 1902：2）而《俄羅斯大風潮》中對巴枯寧之譯介（創作性之翻譯），也是把巴枯寧描述成「棄富貴如敝屣」（3）、「與世界等等險惡搏戰，若因虜流放諸難，莫不備嘗之」（3）、「以革命為恆業者」（4）並說，「巴氏不認世界上之有特權者」，不論是「政治特權」或「生計特權」。其後《民報》、《天義報》也對巴枯寧多有類似介紹，以《天義報》第一號公權的〈巴枯寧學術要旨〉為例，其註說明為「節譯日人《獨立評論》第五冊」，但內容與上述馬君武譯作介紹者大同小異。

反抗現下歷史社會真實存在的不平等。例如，1897年他初讀譚嗣同的《仁學》，就不滿意，當年章著〈平等論〉，反對「去君臣、絕父子、齊男女」的平等說，而將「平等」這個概念歷史化。他認為過去「平等」之說起於佛家，是因為釋迦對於印度不平等的種性制度感到不平，而用「平等」之說來矯正。對他來說，「平等」的論述，是特定脈絡中用來矯正特定現實中不平等的暴力，而非援用一種抽象普世真理來整體性地重構現存社會關係。對他來說，社會關係是現實物質性的產物，即使用「聖王」一詞來表述，他的「聖王」也是莊子式的「因其教，制其宜，不易其俗。」（章太炎 1977c [1897]：5）他不主張父子夫婦之間「引繩而整齊之」，亦即用一種外在於關係的標準來齊一，而認為「君臣之權非平等，而其褒貶則可以平等也。」（章太炎 1977b [1897]：27）這種不贊同君臣男女父子平等的意見，在今日看來似乎政治不正確，但對章來說，所有學說，是為解決現實問題而生產，從《莊子》「齊物」的觀點看，平等不是共同追求同一種平等的狀態，而是不用一個生硬的標準去劃一各種狀態的是非，亦即，是「是非」之間的平等（章太炎 2011c [1935]：588）。泯除或批判了現成秩序裡的是非之見，對於現成政治與經濟秩序裡視為絕對「非」的「竊」，《莊子》早已將其問題化，而討論「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問題性。這也曾為章太炎引用，指出為數眾多受到罪責的「盜」出自貧民，當法律森嚴當不成盜時，也是「轉死於煤坑中」罷了。而帝國主義、文明之國的政治暴力，則是結合了學術與制度性的更嚴重的竊奪：

原政府之初設也，本非以法律衛民而成，乃以爭地劫人而成。今者法令滋章，其所庇仍在強者。貧民以為盜受誅，寧止億兆？其或遷候森嚴不得恣意，則轉死於煤坑中耳。至於帝國主義，則寢食不忘者常在劫殺。雖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為義所當然。夫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此莊生所為憤嫉。……綜觀今世所謂文明之國，其屠戮異洲異色種人，蓋有甚於桀紂。桀紂唯一人，而今則合吏民以為之；桀紂無美名，而今則借學術以文之。……而政府自體，乃適為計謀，聚眾以殺人者……荀卿之時……然尚不如近世帝國主義之甚……檢以禮法，而禮法者又惡人所制也。（章太炎 1907b：14-15）

總之，章太炎所投資的論述位置是「神經病」，是「深山大澤之

夫」、「強盜」等等，而不是規劃整體秩序的「聖人」。其子章導曾憶述：

我父自稱「深山大澤之夫」，也暗稱譽陶煥卿、王金發乃養勇之士，「不膚撓，不目逃」，戲呼陶煥卿為「煥強盜」，王金發為「發強盜」。有一次，我父與我在寓所，看到陶、王同臨，高興地說：「看到你們兩個大小『強盜』，使我精神煥發。」（章導 2009 [1984]：111）

即使這是日常生活戲呼之辭，也見得興致所在。

最後，我們再以一則小故事結束本文。章太炎在獄中時，曾有一名室友徐福生，以「任俠」結怨於人而被囚，章太炎過世後，他寫〈鐵窗感遇記〉紀念，以「人生知己之感莫過於患難之交」開頭。他筆下的章太炎，是因革命而「清廷嫉之」、「幽之於獄」，而他自己則是因任俠結怨於人，「為仇家所陷，亦囚狴犴」，亦即，在他的敘事裡，二人被囚都是因為作為別人的敵人而存在的緣故。「任俠」是章太炎直到三〇年代仍然著重的儒行，他說：「任俠一層，則與民族存亡，非常相關。雖小團體，非此亦不能存在。」（章太炎 2011b [1932]：341）任俠的福生對章太炎「仰望已久」但互不相識，獄中感受到的章與他卻是「一見如故，殷殷折節下交，且諄諄以革命相勗」，章甚至教他讀書，「日令識字若干，親為講解」，他說：「友也而質等於師矣」，獄中二人「起居互顧，衣食相推，疾病相扶持，悲憤相慰藉，」出獄時更是「臨別依依，情之真摯，有勝於家庭骨肉者。」（徐福生 1985 [1936]：2738）對於「任俠」者的感情，體現於生活，大概如此，而這種讓「雲泥遙隔之人萍水相逢」時，追述起來不是一名聖人形象，而是一種勝於家庭骨肉的親近感，也許正是「神經病」的章太炎「志氣」所在。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王汎森。2003。《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

王汎森等。2007。《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台北：聯經。

- 王曉明編。2012。《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海：上海書店。
- 民意。1906。〈紀七月十五日歡迎章炳麟叔叔先生事〉，《民報》第六號，頁119-120。
- 汪榮祖。1988。《康章合論》。台北：聯經。
- 。2008。《章太炎散論》。北京：中華書局。
- 沈延國。2009a(1946)。〈記章太炎先生·在蘇州〉，收錄於《追憶章太炎》，陳平原、杜玲玲編，頁325-330。北京：三聯書店。
- 。2009b(1984)。〈章太炎先生在蘇州〉，收錄於《追憶章太炎》，陳平原、杜玲玲編，頁291-324。北京：三聯書店。
- 沈從民。1985(1936)。〈記鳳凰山館論學——紀念亡友太炎先生——〉，《制言半月刊》25期，頁2687-2690。台北：成文。
- 武繼山譯註。1997。《章太炎詩文選譯》。成都：巴蜀書社。
- 河田悌一。1988。〈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收錄於《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章念馳編，頁488-506。北京：三聯書店。
- 長生。1905。〈神經系統之衛生說〉，《女子世界》2：1，頁1-2。
- 胡覺民著，章念馳整理。1981(1980)。〈湯國梨談章太炎〉，收錄於《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資料紀念專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頁49-5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覺民整理，湯國梨口述。2009(1981)。〈太炎先生軼事簡述〉，收錄於《追憶章太炎》，陳平原，杜玲玲編，頁70-93。北京：三聯書店。
- 范廣欽。2007。〈從鄭觀應到盛宣懷——轉型時代中國大學理念走向成熟〉，收錄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王汎森等著，頁105-135。台北：聯經。
- 孫文。1986(1909)。〈復吳稚暉函〉，收錄於《孫中山全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
- 孫慧敏。2007。〈「新式學校」觀念的形成及影響〉，收錄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王汎森等著，頁81-103。台北：聯經。
- 徐福生。1985(1936)。〈鐵窗感遇記〉，《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頁2738。台北：成文。

- 馬君武。1902。《俄羅斯大風潮·序》，收錄於《俄羅斯大風潮》，克喀伯著，獨立之箇人（馬君武）譯。上海：廣智書局。
- 馬勇編。2003。《章太炎書信集》。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
- 馬敘倫。1991(1948)。〈章太炎〉，收錄於《石屋餘瀟》，民國叢書第三編，頁43-52。上海：上海書店。
- 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1992。《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
- 。朱維錚編校。1998。《康有為大同論二種》。香港：三聯。
- 張昭軍。2002。《儒學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學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庸。1977(1912)。〈章太炎先生答問〉，收錄於《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頁256-265。北京：中華。
- 張寧。2011。〈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期，頁1-40。
- 曹亞伯。1985(1936)。〈談章太炎先生〉，《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頁2701-2702。台北：成文。
- 曹聚仁。2009(1937)。〈關於章太炎先生的回憶〉，收錄於《追憶章太炎》，陳平原、杜玲玲編，頁241-243。北京：三聯書店。
- 梁啟超。1987(1901)。〈康南海傳〉，收錄於《清議報全編》卷八，新民社輯，頁1-40。台北：文海。
- 。（署名「中國之新民」）。1966(1904)。〈論政治能力〉，《新民叢報》四十九號。頁1-12。台北：藝文印書館。
- 梅鶴孫。2004。《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上海：上海古籍。
- 章士釗。1971(1965)。（柳文指要初稿完成之年）、〈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柳文指要》卷十一，頁327-328。北京：中華書局。
- 章太炎。1906a。〈演說錄〉，《民報》第六號。頁1-15。
- 。1906b。〈俱分進化論〉，《民報》第七號，頁1-14。
- 。1906c。〈革命之道德〉，《民報》第八號，頁13-31。

- 。1906d。〈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民報》第十號，頁96-99。
- 。〈署名「軍政府」〉。1907a。〈討滿洲檄〉，《民報》臨時增刊，頁1-8。
- 。1907b。〈五無論〉，《民報》第拾六號，頁1-22。
- 。1907c。〈定復仇是非〉，《民報》第拾六號，頁1-10。
- 。1908a。〈排滿平議〉，《民報》第貳拾壹號，頁1-12。
- 。1908b。〈代議然否論〉，《民報》第貳拾四號，頁1-28。
- 。1977a(1897)。〈致譚獻書〉，收錄於《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頁14-16。北京：中華。
- 。1977b(1897)。〈平等論〉，收錄於《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頁25-27。北京：中華。
- 。1977c(1897)。〈論亞洲宜自為唇齒〉，收錄於《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頁5-7。北京：中華。
- 。1977d(1903)。〈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收錄於《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頁194-208。北京：中華。
- 。1977e (1907a)。〈獄中與威丹唱和詩〉，收錄於《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頁253-255。北京：中華。
- 。1979(1901)。〈謝本師〉，收錄於《章太炎年譜長編》卷二，湯志鈞編，頁121-122。北京：中華。
- 。1985a(1908)。〈贈大將軍鄒君墓表〉，收錄於《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頁228-22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5b(1913)。〈自述學術次第〉，《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頁2649-2666。台北：成文。
- 。1985c(1915)。〈亡女歿事略〉，收錄於《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頁198-19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5d(1922)。〈龔未生事略〉，收錄於《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頁199-2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5e(1928)。〈伯兄教諭君事略〉，收錄於《章太炎全集》（五），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頁196-19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6(1928)。《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上海：上海書店影印出版。
- 。1994a(?)。〈精神病治法〉，收錄於《章太炎全集》（八），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頁131-13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b(1924)。〈論百合顛狂〉，收錄於《章太炎全集》（八），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頁277-27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1a(1920)。〈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收錄於《章太炎演講集》，章念馳編訂，頁20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1b(1932)。〈儒行要旨（一九三二年十月在蘇州中學演講）〉，收錄於《章太炎演講集》，章念馳編訂，頁339-34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1c(1935)。〈諸子略說（下）（一九三五年）〉，收錄於《章太炎演講集》，章念馳編訂，頁581-60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章毅。2009(1985)。〈我的母親章王氏〉，收錄於《追憶章太炎》，陳平原、杜玲玲編，頁99-100。北京：三聯書店。
- 章念馳、潘文奎。1994(1988)。〈章太炎全集（八）醫論集前言〉，收錄於《章太炎全集》（八），頁1-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章念馳。2011(1994)。〈章太炎遺囑〉，收錄於《我的祖父章太炎》，頁47-5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章導。2009(1984)。〈章太炎與王金發〉，收錄於《追憶章太炎》，陳平原、杜玲玲編，頁111-113。北京：三聯書店。
- 許壽裳。1985(1936)。〈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收錄於《制言》第二十五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頁2729-2737，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台北：成文。
- 。2004(1945)。《章太炎傳》。天津：百花文藝。
- 陳平原、杜玲玲編。2009。《追憶章太炎》。北京：三聯書店。
- 陳秀芬。2003。〈中國醫學史中的「癲」與「癩」：一種或多種疾病的類型？〉，《中醫兒科醫學雜誌》第五卷第一期，頁1-16。
- 。2010。〈「畫」說瘋狂——晚清報刊圖像中的瘋人形象與社會處置〉，發表於「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10/11/24-26。

——。2011。陳秀芬提供〈「畫」說瘋狂——晚清報刊圖像中的瘋人形象與社會處置〉一修稿。

陳邦賢。1991(1947)。《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書店。

湯志鈞編。1979。《章太炎年譜長編（一八六八～一九一八年）》。北京：中華書局。

馮自由。1985(1936)。〈弔章太炎先生〉，收錄於《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頁2699-2700。台北：成文。

——。2009（1943）。〈記章太炎與余訂交始末〉，收錄於《追憶章太炎》，陳平原，杜玲玲編，頁25-28。北京：三聯書店。

黃遠庸。1990（1914）。〈記太炎〉，收錄於《黃遠生遺著》卷二，民國叢書，頁192-194。上海：上海書店。

楊宇勳。2003。〈降妖與幽禁——宋人對精神病患的處置〉，《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三十一期，頁37-89。

——。2006。〈從政治、異能與世人態度談宋代精神異常者〉，《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三十一期，頁19-48。

劉人鵬。2011。〈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收錄於《置疑婚姻家為連續體》，丁乃非、劉人鵬編，頁33-68。台北：蜃樓出版社。

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2012。《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台北：蜃樓出版社。

劉文典。2009(1957)。〈回憶章太炎先生〉，收錄於《追憶章太炎》，陳平原、杜玲玲編，頁51-53。北京：三聯書店。

劉成禹。2010。〈章太炎被杖〉，收錄於《世載堂雜憶（全編本）》，劉成禹著，蔡登山輯，頁204-205。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劉師培。1998(1904)。〈論激烈的好處〉，收錄於《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李妙根編，頁63-66。香港：三聯。

蔡元培。1984a(1907)。〈復吳敬恆函〉，收錄於《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高平叔編，頁401-403。北京：中華書局。

——。1984b(1907)。〈讀章氏所作《鄒容傳》〉，收錄於《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高平叔編，頁398-401。北京：中華書局。

諸祖耿。1985(1936)。〈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太炎先生紀念專號」，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頁2721-2726。台北：成文。

震（何震）、申叔（劉師培）。1907。〈論種族革命與無政府革命之得失〉，《天義》第六卷，頁135-144。

魯迅。2005(1936)。〈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收錄於《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末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錢大成。1948/04/09。〈章太炎逸事〉。《申報》第25195號，第7版。

錢超塵。2009。〈《章太炎先生論傷寒》釋要〉，收錄於《章太炎先生論傷寒》，伍悅、林霖輯校，頁212-317。北京：學苑出版社。

鞠普。1908。〈禮運大同釋義〉。《新世紀》第38號。

龔自珍。2012。〈乙丙之際著議第九〉，收錄於《中國現代思想文選》，王曉明編。上海：上海書店。

二、英文書目

Chen, Hsiu-fen. 2003. *Medicine,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Madness in Imperial China*. Ph.D. Thesi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Feder, Lilian. 1980. *Madness i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三、報刊資料

《申報》。2008。原報縮小影印。上海市：上海書店。

《民報》。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影印初版。

四、網路資料

王敏東。2010。〈「神經病」、「神精病」和「精神病」〉，《語文建設通訊》第九十五期。<http://www.huayuqiao.org/DOC9500/9511.htm>。（2012/10/24瀏覽）